

南河畔的故事》、《花街》、《弄斧集》等。

第一章 年腊梅与老舍相似的人生经历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泰国华侨华人逐渐接受从中国传来的新文化和新文学，并由此产生了以泰国华族及泰族人的社会生活题材以及使用中国汉语现代白话文创作的泰国华文新文学。泰华新文学不是中国新文学的分支，而属于世界华文文学的范畴，中国文学和泰华文学有着紧密的联系，因为泰华新文学是在中国的“五四”新文学影响下产生的，使用汉语，并继承了中华文化精神。

以“五四”为起点的中国现代文学，开创了中国文学史的新纪元，出现了群星璀璨，百花竞放的局面，无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老舍作为这一时期的杰出作家，其作品无论题材和艺术风格都极具代表性。而年腊梅则是活跃于当时泰国文坛的作家之一。不同的国度，相似的创作风格及人生经历吸引后学以比较的视角来探讨其作品的文化蕴含及社会意义。

年腊梅和老舍都是出生于动乱的战争年代、自幼丧父、家境贫寒、身挑家庭重担，生活经历艰辛坎坷。他们都深知底层社会民众的生活与疾苦。

第一节 身世背景

华人移居泰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据史料记载，西汉平帝元始年间（公元1-5年），中国的航船就到达过泰国。此后，因中泰关系的密切，中国沿海地区逐渐有人去泰国经商、定居。这些劳动力有较高的生产技能和吃苦耐劳的精神，颇受泰国人民的欢迎。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平均每年有十多万中国劳工进入泰国。移居泰国的华侨华人既给所在国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又在与泰族人民和睦共处、文化交融的同时，通过华文教育源源不断地传承着中国的文化和文学。

1938年，泰国与日本签订《暹日条约》。为了帮助日本实现“大东亚文化圈”的战略目标，亲日的泰国政府展开了禁绝华文的活动。次年八月，釜披汶封闭了泰京八家华文报，并大规模查封华校。到了1940年6月，全泰国二百九十三所

华校荡然无存。出生于这一时期的年腊梅当然无华语学校可读了。

此后的三十余年里，泰国政府对华文教育的政策呈现出封闭——放松——限制——放宽的反复状态。鉴于特定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局势，泰国政府曾一度做过适当的变通，然而，在这三十年中，泰国政府对华文教育的政策仍以抑制为主，汉语的地位几经沉浮。

泰国华文女作家年腊梅，原名许静华，年腊梅是她的泰文名字。1934年6月16日生于泰国。祖籍中国广东省饶平县。常用的笔名有：无盐、许心怡、李虹、李洵、李可欣等。年腊梅的祖父是华侨，祖母是泰国人，父亲是中泰混血儿，母亲是华侨。父亲早年经营农场兼做海产、粮食生意，家庭生活富裕。日本侵华前夕，父母变卖家产，将全部资金汇回中国，想在故乡置业安家。但随着日寇侵华及占领泰国，全家人与中国大陆失去联系，家道中落。父亲经不起经济破产的打击，忧愤成疾，在年腊梅七岁的时候撒手人寰，家庭生活随即一落千丈。母亲靠做小贩挑担买卖带着全家大小七口人艰难度日。为分担母亲的重担，年腊梅8岁开始即打工，做学徒学织布和裁缝，也做过女佣。年腊梅14岁成为一名正式的织布工人，而且后来成为了一名服装师。由于家境贫寒，年腊梅家庭条件只能勉强撑着让两个弟弟进学校，她姐姐无缘进学校，而年腊梅也只读过一年泰文。年幼的她，尝尽了各种杂工的艰辛和酸楚，但同时也练就了她坚毅不屈的个性。

中国现代小说家、剧作家老舍是海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作家。老舍原名舒庆春，笔名有“舍予”、“老舍”等。1899年2月3日出生于北京一个贫寒的清末满族家庭里。老舍先生出生的时候，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古老封建帝国的政治体系崩溃，整个社会处在风云激荡中。父亲舒永寿是保卫皇城的一名士兵，1900年8月15日在抵抗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巷战中阵亡。由于老舍的父亲过早去世，家庭生活变得更为艰难，一家人全靠母亲缝洗和当佣工的微薄收入勉强度日。老舍刚一懂事，便知道了愁吃愁喝，自幼过惯了缺吃少穿的生活，一向是守着“命该如此”的看法；母亲的含辛茹苦，经济上的羞涩拮据，生活上的巨大压力，给老舍幼小的心灵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从而塑造了老舍自幼刚强、自尊上进，勤奋好学的性格。这些艰辛的生活经历使得他身不由己地处在在北京底层市民的行列里，在大杂院里与贫穷阶层的市民朝夕相处，小巷里居民的琐碎事充满于耳，灌满于心。使老舍从小就熟悉车夫、小业主、小商贩、工人、下等艺人和娼妓等挣

扎在水生火热的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深知他们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也使他从小就喜爱上流传于市井巷里的传统艺术，如戏剧、曲艺等，这些都是他后来文学倾向于写平民生活和擅长于话剧创作的生活基础。

二 第二节 创作生涯

年腊梅虽只读过一年泰文，但母亲曾是红极一时的潮剧名青衣，由于从小受母亲讲故事和唱词曲的熏陶，使她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浓厚兴趣。尽管母亲反对，但她仍然坚持不懈，勤学苦练，白天做完苦工，晚上就躲进被窝里用手电筒偷偷看书，用中文拼命地练习写作。自小热爱文学的她穷尽毕生精力从事文学创作，癌症晚期躺在病床上，还在争分夺秒的修改文稿。在当织布女工期间，她的第一篇习作《让位》在曼谷华文报的“少年园地”发表。从此她和文学结缘。并下定决心拼命挤时间读书写作，锲而不舍。在年腊梅创作的道路上，有两位重要的文坛前辈，即张综灵和方修畅。1952年年腊梅认识了张综灵，他当时任曼谷《中原报》编辑，负责“国际”、“服务”、“通俗小说”和《大众文艺》等版面编辑工作，年腊梅凭着“试一试的心理”给《大众文艺》寄去了散文《童年忆》，没想到果真刊登了，并收到了张综灵的一封信，约她到报社会晤。对于这件影响她一生的事，年腊梅曾说：“他见面便问起我的生活情形和学习状况，送给我好几本书，记得其中有卡耐基的《处世教育》、《世界史大纲》、《世界地理大纲》、苏曼殊《断鸿零雁》、《唐诗三百首》、《词选》、还有一本张先生的《实用新闻学》。”^{[1][P15]}张先生还对她说，“写作的素材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去寻觅，你除了读文艺书籍外，也应该读应用文和史地，然后再读古典文学对写作才有进步……”^{[2][P153]}接受张综灵的指导和建议，捧着他送的书，年腊梅日夜啃书，由白话文再到古典文学，一一品味。1955年，泰国《世界日报》创刊，张综灵任总编辑，他介绍年腊梅到该报社当一名剪报员，历时四年。

另一位对年腊梅的文学生涯起重要作用的人是方修畅先生。他是年腊梅十八九岁时候认识的。当时，方修畅任《中原报》“大众文艺”版编辑。年腊梅给该

[1] 陈贤茂主编. 泰国文学史第二卷[M]. 厦门:鹭江出版社, 1999. (8)

[2] 张国培. 20世纪泰国华文文学史[M].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7. (7)

报的四个板块：“学习”、“通俗小说”、“万象”、“大众文艺”投稿。方修畅在“万象”版刊登了她的文章后约她前去见面。从第一次捧着方修畅借给她阅读的文艺理论书和小说集之后，年腊梅便经常去拜访方先生，向他老人家请教一些文艺理论难题，同时也和方先生的两位千金华儿和莱儿结为朋友。方修畅对年腊梅的指导和栽培，使她永远铭记于心。年腊梅说：“每次读方修畅先生的诗，总会想起三十年前他老人家对我栽培的一片苦心，他的教育、以及对一个小辈的关怀。”^{[1][P154]}

泰华新文学的创始时期，是在中国的五四运动时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一些在大陆求学的华侨青年和新移民从大陆南渡。他们在国内接受了新文学思潮的影响，来泰国后又大多从事文化、教育、新闻等工作，这些青年接受了提倡新文化的激进思想，开启了华侨作家用华文进行创作的先河，并由此开始了泰华新文学的拓荒时期。从1956年到1975年，泰华文学经历了一个波浪形的“繁荣转入沉寂”时期。1955年4月在万隆会议上，中泰两国外长就华侨双重国籍问题达成协定，许多华侨加入泰国国籍，为华侨的生存提供了保障，也缓和了泰华关系。一些泰国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华侨文学青年已经相继成熟，成为泰华文坛的生力军。其中，年腊梅就活跃于这一时期。1964年，由方思若与其夫人何韵创办的《华风周报》，通过与众多泰华作家的共同努力，推出了第二个长篇接龙小说《风雨耀华力》。年腊梅是创作者之一。

艰难困苦的生活压力和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磨练了她坚强的意志，也使她从中体验到真实的社会与人生，特别是下层社会人民生活的形形色色。对文学创作的执着追求和向往激发了她日日夜夜勤学苦练的决心和毅力；名师的启蒙和指引更使她对生活道路的选择充满信心。尽管创作的道路布满荆棘，但她仍然以坚强不屈的毅力排除万难，她的内心充满去争取胜利的精神激励着她奋勇向前，最终成为泰华文坛上最杰出的女作家。三十多年来，年腊梅问世的作品约计一百余万字。其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花街》、《湄南河畔的故事》、中篇小说《在鹰爪花架下》、长篇小说集《黑腊肠》、散文集《长春藤》、杂文小品《弄斧集》、人物写真集《泰华写作人剪影》及与几位泰华作家共同出版的小说集《轻风吹在湄江上》、《尽在不言中》、《泰华短篇小说集》等。

[1] 张国培. 20世纪泰国华文文学史[M].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7(7)

泰国华文女作家年腊梅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写作，曾任泰国《世界日报》资料室职员，泰国《新中源报》新闻版编辑，《中华日报》经济版编辑，《中华日报》文学、华园、妇女版编辑，泰华写作人协会理事等职务。1993年3月28日在泰国曼谷家中因病逝世。享年五十九岁。

老舍于191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担任过小学校长、郊外北区劝学员等职。“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提倡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思潮，把他从“兢兢业业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的人生信条中惊醒；文学革命的勃兴，又使他“醉心新文艺”，由此开始生命和事业的新起点。1924年夏，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华语教员，并开始从事文学创作。自1925年起，陆续写了3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对乌烟瘴气的教育界作了生动的揭露；《赵子曰》的鞭挞锋芒指向以新派自诩其实醉生梦死的青年学生；《二马》的主人公是旅居英国的北京人，讽刺的仍是在封建的小生产的社会土壤里培植出来的“出窝儿老”的畸形心态——都以清脆的北京口语，俏皮的幽默笔墨，渲染北京的民俗风情，通过闭塞守旧、苟且偷安的民族心理的剖析，申诉对于祖国命运的忧患，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和思想视角。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1929年夏，绕道欧、亚回国。在新加坡逗留期间，为当地高涨的民族解放要求所鼓舞，创作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年7月起，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1934年秋，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在这两所大学，相继开设文学概论、外国文学史、欧洲文艺思潮、小说创作法等课程。课余继续从事创作。沿袭原来的艺术取向的，有长篇小说《离婚》和《牛天赐传》等，都写得富有生活情趣和喜剧效果。比之早期作品，描写从浅露取向含蓄，相当圆熟地形成他作为幽默作家、北京人情世态的风俗画师、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独特的艺术风格。面对愈来愈残酷的社会现实，创作呈现两种新的趋势：一是日益关切国家大事，由此触发写作的灵感。一是更加关怀重视贫民的苦难，以此作为主要描写对象：《月牙儿》叙述母女两代沦为暗娼；《骆驼祥子》以农村来到城市拉车的祥子个人的毁灭，写出一场沉痛的社会悲剧。把城市底层暗无天日的生活引进现代文学的艺术世界，是老舍的一大建树。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1月济南沦陷前夕，只身奔赴武汉。1938年3月，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出任总务部主任。抗战8年中，对文艺界的

团结抗日多有贡献。他写于抗战时期的作品，也多以直接为民族解放服务为宗旨。长篇小说《四世同堂》是他抗战时期的力作，也是抗战文艺的重要收获。1946年3月，老舍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从事创作和将自己的作品译成英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老舍在美国收到周恩来总理邀请他回国写作的信件，便立即抱病束装就道，于1949年12月12日回到故乡北京。此后，老舍曾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历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中朝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务，并多次代表中国作家到朝鲜、苏联、印度、捷克斯洛伐克、日本等国访问。

1951年初创作的《龙须沟》，写出了历经沧桑的北京和备尝艰辛的城市平民正在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是献给新中国的一曲颂歌。《龙须沟》是老舍创作上的里程碑，他因此获得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

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他在文艺、政治、社会、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担任多种职务，但仍勤奋创作。五十年代后半期创作的话剧《茶馆》描绘了近代北平的历史风云。以一座茶馆作为舞台，展开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盘踞时期、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三个时代的生活场景和历史动向，写出旧中国的日趋衰微，揭示必须寻找别的出路的真理。《茶馆》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最享盛名的保留剧目，继《骆驼祥子》之后，再次为老舍赢得国际荣誉。

“老舍不但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甚至几乎获得国际最负盛名的诺贝尔文学奖。老舍在一九六八年被提名，到了最后五名还有他，秘密投票结果，第一名就是老舍。各国言传老舍已经去世，瑞典就派驻华大使去寻访老舍下落，又发动其它国家进行联合调查，中国官方对此没有答复，老舍实际已经死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由于瑞典方面断定老舍已经去世，而诺贝尔奖一般不颁给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决定再剩下的四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给一个东方人。结果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成了日本的川端康成。”^{[1][P23]}

老舍在四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思想艺术上不断取得重要进展和突破。他写

[1] 舒乙. 我的思念——关于老舍先生[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9. (2)